



毛泽东 启迪心灵的艺术

章 贺 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毛泽东启迪心灵的艺术

章 贺 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5463
(京)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启迪心灵的艺术/章贺编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11
ISBN7-5035-0850-7/A·38

I. 毛…

II. 章…

III. 毛泽东-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北京顺义张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1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2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06千字 印数: 3000—11000册

定价: 5.40元

在改革开放中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

李德生

一九九三年九月四日

责任编辑 孙 奇
封面设计 张志明
版式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魏晓玲

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求育人艺术

——代序言

公方彬

章贺先生邀我在其著作《毛泽东启迪心灵的艺术》出版之际写几句话，基于对该书价值的认同和对作者的敬重，婉拒再三后还是承诺下来。

如何认识、理解和学习毛泽东的育人艺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可谓走了很远，但从理论上予以全面准确地把握，以求运用得更加理性和自觉，似做得并不很够，至少像章贺先生这样较为全面系统地予以挖掘论述的著作，所见并非很多，尤其当我们进一步注意到章贺先生在学习领会毛泽东育人艺术的过程中，已感悟出新的富有价值的思想，无疑这是令人称道，并为之感奋的。

窃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理论上的科学和实践中的艺术，曾经和正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有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起到了巨大而又极富成效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即包含了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换言之，已获得巨大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反映和表现着我们党在做人的工作中所具备的高超艺术与优良的智慧。

未必不可以这样认为：

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是一种说理的艺术，具有很强的理论的严密性和逻辑的说服力。毛泽东早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说过：“只有采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甚至在红军时期就主持制订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方法、手段的一系列条例和规定。正是由于这种反对空洞说教，坚持以理服人的正确思想指导，从而使之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作用愈来愈大，地位愈来愈重要，最后发展至“生命线”的程度。

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是以增强我党我军自身向上的精神力量为目的，以“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为理论基础，因而十分注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强调对人的潜能的最大调动和发挥。毛泽东在1937年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这项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实践证明，这三条原则真正起到了鼓舞自己和瓦解敌军的作用。后来在《论持久战》中又进一步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灌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灌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至于论及以情带兵，以情育人，更是详尽周全，甚至具体规定了谈话的态度方式，要求“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进行，强调关心要具体，送温暖要恰当及时，比如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要求“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在1934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

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拥护我们。”如此以人为对象，以人为根本，并从感情入手，化解矛盾，启发觉悟，鼓舞热情的思想教育艺术，定会产生积极而又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是产生于两大阶级的政治对抗基础之上，因而自始至终都强调党组织的作用，强调在此基础上的群众性与教育者的模范带头作用。毛泽东在1928年《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分析“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理性的经验总结，直接促成后来《古田会议决议》中将“每连建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作为党的组织路线予以贯彻执行。由于强调了党组织的作用，并使这种作用和发挥作用的形式系统化、规范化，而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发展成熟起来。也正是由于有了党组织在发挥“中枢神经”的作用，方可使这一工作真正成为人人是教育者，人人又是被教育者的群众性工作，方可使教育者不断完善自己，以模范带头，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

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是一种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改造人，最终使人进步的艺术，因而十分注重批评后的团结。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种指导思想实际一直贯穿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过程中，结果无疑真正起到了使犯了错误，并受到批评惩罚的同志，真正理解到批评惩处是对自己的爱护，是对自己的帮助，于是在思想通，认识明的基础上，接受教训，轻装上阵。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在不断给许多同志指出错误，甚至予以惩处的过程中，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无疑是起于贯彻了“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团结”的思想指导原则。

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是面对思想观念一直处于流变中的人与发展中的事物，因而十分注重理论与实际相贴近，与实践

相结合，并强调灵活多变，生动活泼的工作方法。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理论，可以推至《古田会议决议》中，他提出：教育同志，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这就是说，只有在了解了事情的全貌和背景材料，并借助各种力量才可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毫无疑问，理论联系实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直是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艺术的精髓。

一言以蔽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武器和胜利的法宝，博大精深，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也同样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走向科学化的理论基础，丰富而又深刻，远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每一个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只有不断从中吸取营养，才能更好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发扬光大。

章贺先生以多年的研究予读者的奉献，期间虽未见得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但却也算得上是苦心孤诣，集腋成裘的结果，诚为可喜可贺，可敬可佩，我斗胆抓笔，不揣冒昧，实出于发自内心的对作者的敬意。汗颜之余，了为数语，是则为序。

1993年7月于北京海淀区

厢红旗二号

· 目 录 ·

说理篇	(1)
一 循循善诱	(1)
二 真理是具体的	(6)
三 谈笑风生	(9)
四 寓理于例	(17)
五 小中见大	(21)
六 逻辑的力量	(25)
七 辩证的启迪	(29)
八 实事求是	(34)
语言篇	(39)
一 平易近人	(39)
二 巧喻善导	(44)
三 简洁明快	(48)
四 情真意诚	(52)
五 曲径通幽	(57)
六 出语惊人	(62)
七 古为今用	(66)

人 才 篇 (70)

一 慧眼识珠..... (70)

二 知人善任..... (76)

三 礼贤下士..... (82)

四 金无足赤..... (86)

五 护才之心..... (92)

六 扬长补短..... (97)

七 海人不倦..... (100)

团 结 篇 (106)

一 照顾大局..... (106)

二 尊重别人..... (111)

三 五湖四海..... (117)

四 容人胸怀..... (121)

五 多一点人好..... (128)

批 评 篇 (132)

一 鲜明尖锐..... (132)

二 一分为二..... (138)

三 “文武之道” (141)

四 遇事虚怀..... (145)

五 择善从之..... (150)

六 责己感人 (154)

调 研 篇 (160)

一	“十月怀胎”	(160)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164)
三	“一指之隔”	(167)
四	谦良恭谨	(169)

方 法 篇

一	理论灌输与自我教育	(175)
二	务虚与务实	(180)
三	普遍教育与具体指导	(182)
四	言传与身教	(189)
五	褒奖与惩戒	(192)

借 鉴 篇

一	旧瓶新酒	(198)
二	古籍新解	(204)
三	他山之石	(205)
四	沟通心理	(209)
五	出色导演	(212)

正 身 篇

一	为了人民的利益	(219)
二	按月亮办事	(223)
三	危险留给自己	(226)
四	不是为了吃世界	(230)
五	都是同志	(237)
六	严格家教	(241)

· 说 · 理 · 篇 ·

说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一项重要内容。

宣传马列主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列宁认为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而只能由革命的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也就是教育者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向被教育者传播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灌输，实际上就是一种说理。

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所以能收到良好的效果，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讲的马克思主义道理也就具有了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而为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成为改造中国的巨大物质力量。

其次，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列主义方法论，因而他能够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思想结合起来，他说理就既有思想的深刻性，又有贴近生活的现实性和解决问题的针对性。

第三，毛泽东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坚持群众路线，使毛泽东在说理时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态度。

一、循循善诱

毛泽东历来主张，对待思想问题，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去

处理，只有采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就是疏通引导的办法，通过反复说服，耐心等待，因势利导，把大家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从而把大家的行动纳入到正确的轨道。

1930年，中央决定红军进行整编，战略上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了避开当时尚处于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毛泽东除对右的地方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艰苦的说服外，主要地以极大的耐心说服一部分受立三路线影响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这一说服工作是很艰巨的，毛泽东既要考虑组织纪律问题，不致同党中央发生公开对抗，又要考虑如何坚持正确主张，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通过会上会下，做思想上的说服工作，在军事上慎重行动，巧妙安排，耐心等待，抓准时机，因势利导，逐步纠正，团结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广大干部，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0年6月，红一军团接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夺取南昌、九江的命令时，正在闽西汀州休整。朱德、毛泽东6月22日签发的向江西进军的命令，虽然传达了中央给予的“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但未做出打南昌的部署，而是要部队开赴江西广昌、兴国集结，并首先攻占了樟树镇，然后又西渡赣江，7月30日到达离南昌约30里的生米街，8月1日派出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南昌守敌没有还枪，也未出来。我军没有进攻南昌，而是转向万载、高安一带，连克十余县，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扩大队伍。这就使红一军团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

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从当地搜集到的报纸上得知，红三军团一度冒险攻打长沙，在强敌反攻下又被迫退了出来。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红一军团向湖南西进，到永和市与三

军团领导机关会合，组成了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样，统一指挥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战略思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由于中央指示要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三军团少数领导干部，受立三路线影响，不顾客观情况，坚持要打长沙，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打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毛泽东不赞成攻长沙，他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蒋、冯、阎还在混战，形势很好，但红军还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长沙城内有敌军三十一个团，我们的兵力共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敌人多我一倍多，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长沙城内也无工人、士兵运动作我军内应。

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一方面以极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在行动上采取能够被三军团接受的办法，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推进”。进抵长沙近郊后，总前委又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8月底至9月11日，敌人除三十一师从猴子石出击，被我歼灭两个团外，其主力始终没有离开阵地，我军亦两次出击，均未奏效。这个时候，毛泽东抓住时机，因势利导，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南郊散开，诱敌出击，然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时，从长江局又传来张发奎和桂系部队已进到湘潭的消息，又建议先消灭张桂军再打长沙。毛泽东又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总前委下令红一方面军“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这样红一方面军就撤了长沙之围。

对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观点，即使诸如在革命信念这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也不能以势压人，而应该循循善诱，“有针对性分析指出错误的症结所在，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在困难中指出光明，在曲折中指明坦途。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林彪所代表的一部分人对革

命前途的悲观思想所写的党内通信就是这方面的范例。正如周恩来说的，在对待思想斗争问题上，谁也没有像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那种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由于敌人的不断“进剿”和“会剿”，由于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三月失败”，一部分人感到革命的前途渺茫，一再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严重障碍。1928年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1928年10月4日至6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又进一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 合上，科学地、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在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暴露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看法的悲观情绪，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缺乏信心，因而建议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毛泽东敏感地觉察到这种错误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于1930年1月5日郑重地给林彪写了一封长篇复信，并将这封信油印发至各大队党支部，以教育红四军全体党员和干部。

在这篇著名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不仅指出林彪的错误是对时局的估计“比较悲观”，“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而且指出了这种错误思想的产生是由于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他说：

“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种错误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毛泽东没有停留在对错误的批判分析上，而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武装割据的经验，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政治形势，系统地提出

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与之相适应初步制定出一整套实现这一道路的方针政策。信中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前景的生动描述，在当时对于消除人们的悲观思想，增强人们的革命信心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正确思想的形成和错误思想的克服都需要有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尤其是一种错误思想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并且形成了一条与之相应的错误路线，而正确的思想处于少数的时候，要使人们的思想转变一是靠理论上的说服，二是要有正确引导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事斗争时期尤其这样，形势千变万化，不允许放下军事斗争去争论思想理论问题。毛泽东正是采用了思想上的说服和行动上的引导有机结合的方法。这就是引导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们思想上的转变在实践的切身体验中找到一种契机才能逐渐自觉地接受正确思想并成为行动的指南。

要做到循循善诱，领导者对下级要采取平等的态度，要有民主的作风，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方法，让他们自己觉悟，主动改变自己的认识。古田会议后，前委和毛泽东率领二纵队向江西进军途中，一天，二纵队四支队政委赖传珠便向纵队部去，在那里听说他们派向清源、宁化方向的一个游击排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卢新铭部，是四支队的手下败将，赖传珠便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毛泽东听后让赖传珠不要急，坐下来开会研究研究打还是不打。会上毛泽东要赖传珠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赖传珠说敌人不顶打，一打准缴他的枪。毛泽东听后，一方面肯定赖传珠信心足，另一方面指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赶快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这样就会增加行动的困难。如果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最后，毛泽东又征询赖传珠的意见打和不打那个有利。赖传珠马上同意不打。毛泽东并未到此就下结论，而是在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意见都同意不打后，又